

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问题是要勇于改正,这样才可以成为合格的人。“修德”、“讲学”、“徙义”、“改过”,是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路径。这就要求“修身”,以求得一“安身立命”处。^①

在儒家看来,要解决上述的种种矛盾,其中“人”是关键。因为,只有人才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儒学可以为其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善于利用儒学的思想资源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可以说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并不十全十美,它并不能全盘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它只能给我们提供思考的路子和有价值的理念,启发我们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智慧,在给这些思想资源以适应现代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前途新诠释的基础上,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做出它可能做出的贡献。

司马迁说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是很有道理的名言。我们生活在今天,要了解自古以来治乱兴衰的道理,把它作为一面镜子,但是古今不一定相同,需要以我们的智慧,在传承前人有价值的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对自古以来的有价值的思想(包括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创造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学说、新理论。

〔责任编辑:魏长宝〕

财富伦理引论

——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三十周年而作

唐凯麟

《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刊,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30年来,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高水平、广视野、前沿性和原创性为办刊特色,团结和推动中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开拓创新,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艰苦探索和锐意创新,成为深刻反映学术前沿、时代精神和中国经验的权威阵地,展示中华民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当代智慧的重要窗口,培养新人、壮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重要摇篮。作为她的忠实读者,也作为一名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以来所做的巨大贡献,笔者深受其惠。故在她创刊30周年之际,笔者不揣冒昧,把十几年来对财富伦理所做的一点理论思考整理成文,以资庆贺。

(一) 财富伦理的基本内涵。财富伦理是指人们创造、占有和使用财富的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蕴含的伦理内涵和道德意蕴。它是人类在认识、创造、支

^① 朱熹《四书或问》中说:“……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安泰;其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乖错。其间一国一家,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盖人生在世,必有一“安身立命”之原则和境界。

配和使用财富的过程中,对个体与个体、个体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观念把握,是经济行为的价值依据,也是人类根据财富的本质要求去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和使用财富的精神动力。财富伦理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创造财富的冲动力,二是节约财富的抑制力,三是合理运用财富的智慧。财富伦理要求人们从人的主体性出发,通过创造财富来发展自身的个性和潜能,通过合理运用财富来获得生存的意义,以实现自身的价值。财富伦理要追求的是财富与人、财富与自然、财富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财富伦理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一种理性调节,是一种向善的实践理性,规范和调节着经济利益的分割,既具有现实性基础,又包含着对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思和超越。在内涵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关于财富价值大小的问题,即财富价值观;关于获取财富手段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即致富观;关于支配使用财富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问题,即消费观。其中,对财富价值的理解是其思想观念基础,致富观是其核心,消费观则是前二者的现实结果。财富伦理的存在与运行是一个具体过程,它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具体的经济行为中会产生或善、或恶的道德后果。

(二) 财富伦理的发展历史。财富伦理早已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一直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财富伦理观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人类对财富的认识首先是从物的有用性开始的,认为凡是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都具有财富的意蕴。“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人“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①这一时期,由于实物形态的财富观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一般都将土地视为财富的标志。例如,西方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生产财富,工商业者不但不生产财富,还要分掉由农业生产出来的财富;在中国,则表现为“崇本抑末”思想的盛行。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人们的财富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富不再局限在以土地为代表的实物上,货币成为财富的标志,甚至形成一种拜物教意识。“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②“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财富实现了从物质形态向非物质形态的转化,虚拟财富成为新的热点。在当代社会中,实物财富观、货币财富观、虚拟财富观这些新旧财富价值观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个多元并存的格局。更为重要的是,财富正在从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经济领域的工具理性原则正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造成了哈贝马斯所谓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财富伦理是人们在财富出现后进行反思的产物,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管子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财富与财富伦理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般表现为财富创造能力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但财富伦理水平却并不一定能随此而进步。在阶级社会中,财富伦理反映着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表现出较强的阶级性,它强化着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甚至出现过否定物质财富的倾向。例如,西方中世纪曾被基督教禁欲主义统治。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这种禁欲主义财富伦理观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西方所以出现资本主义,和基督新教的制欲精神特别有关,去掉这一因素,西方的其他历史条件不见得会创造今天的这个形势。”^④与这种“重伦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5、4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页。

④ 顾忠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0页。

轻财富”的倾向相反的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定阶段却出现了“重财富,轻伦理”的观念。财富的丰裕程度与伦理道德水平出现了严重背离,财富往往成为不道德的诱因,如拉罗什福科所说的“德行消失在利益之中,正如江河流逝入海”,“财富能使我们的美德和恶性充分表露,就象光线显示出各种物体”。^①可见,仓廩实和衣食足、知礼节和知荣辱之间只是一种理论上的逻辑关系,而不是一种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二者间转换的关键在于确立起合理的财富伦理观。

在历史上,东西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财富伦理观,体现出不同文明的特质。中国古代较少地关注财富属性,而更多地关注财富的意义。这种财富伦理观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义利关系贯穿于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义利观是财富伦理观的思想基础。义利观围绕着人类应当如何合理地追求财富、如何正当地分配财富、如何正确地评价其中的人性等问题展开。二是中国古代财富伦理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三是“公利至上”、“平均主义”是中国古代财富伦理观的基本价值取向。反观西方古代,则是以财富与经济活动的关系为主题,侧重于对财富属性、财富价值和包括生产、增殖、分配、使用在内的财富运行过程中的伦理问题的研究。

(三) 财富伦理研究的基本原则。财富伦理要求对财富加以哲学的考量和意义的审视,其中涉及目的和手段、公平和效率、利益和价值,追问如何创造财富、谁来消费财富以及如何消费财富等问题。财富正义是正义理念在财富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主要表现为生产正义、交换正义、分配正义和消费正义等。财富伦理的建构必然涉及财富活动的价值标准问题。一旦形成了一定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财富伦理就会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力量,制约着那些在财富问题上的不道德行为。因此,财富伦理必须解决两个问题:财富正义何以可能?财富正义如何实现?

为了回答上述两个问题,财富伦理研究须把握三个基本原则:其一,正义性是财富伦理的基础,必须坚持正义原则。其二,财富伦理是财富运行过程的能动反映,必须遵循财富运动的客观规律。其三,财富伦理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

财富伦理追求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正义和善。首先,财富获取的正当性,即人们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的伦理依据。肯定追求财富的正当性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体现了财富运动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要求。其次,财富分配的正义性,即财富究竟是被少数人独占还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财富的分配应体现出社会正义原则,应建立起既不损害经济效率,又能充分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财富分配制度。第三,财富使用与消费的合理性,即在处理人与财富的关系时,应坚持以人为本,张扬人的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建立起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的财富伦理观。

(四) 财富伦理研究的当代意义。人类社会在农业文明时代形成的生产型财富伦理观强调多生产、少消费,减少支出、增加积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消费逐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激发需求、刺激消费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世界各国为了发展经济,纷纷推行刺激消费的发展战略,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人的异化、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也就在所难免。人类是否可以走出物质丰富与精神匮乏、生产发展与生态破坏的两难困境呢?破解这一难题,建立一套包括财富伦理在内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势在必行。

归根到底,所谓的“发展危机”和“现代化困境”是人们在对待财富问题上的文化冷漠和

^① 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许国政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第384页。

价值迷失造成的。艾伦·杜宁在《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一书中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消费不仅造成了环境的巨大破坏，而且财富消费对幸福感提升的作用也变得微乎其微。^①摆脱消费社会的困境，关键是要对消费作出合理的界定，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消费伦理观。在马克思看来，消费是人再生产自身的一种方式。只要是“生产的”消费，就能够为生产的发展提供方向。如果消费被抽象化，脱离人的其他社会活动而存在，就可能成为一种单纯的物质欲望的宣泄，从而导致人的异化。见田宗介认为，消费的本意是对生命的充溢和对喜悦的追求，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消费社会，应该比任何以生产为目的的产业社会对自然和社会的掠夺都要少。^②合理的消费观有助于克服传统节俭消费伦理的缺陷和现代奢侈消费伦理的弊端，有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加快经济增长、提高生产力水平是人的自由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必要前提。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意味着人的自由空间的扩大。另一方面，重视和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要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不过是空中楼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③

财富伦理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自觉和自为的历史进程。现代财富伦理倡导人们正确地理解财富价值，用合乎伦理要求的手段创造财富，用健康文明的方式使用财富，以促进目的与手段、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在现代生活中，财富伦理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从生产环节看，财富伦理揭示经济与伦理是“孪生兄弟”。虽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了商品经济建立在人的自私性基础上，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又指出：“人不应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孤立的人，而应该把自己看作世界中的一个公民，看作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的一个成员。他应当时刻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而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④他认为，人所具有的同情心使得道德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人类社会由此才免于陷入混乱。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然而一旦离开了伦理道德的规约与引导，市场经济将无法正常运行。丹尼尔·贝尔指出，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约翰·洛克到亚当·斯密，传统的道德哲学家都未曾割裂经济与人文的联系，强调物质的生产是促进美德、创建文明生活的手段。他认为，“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是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十分有效，不过只有在塑造它的文化价值系统内它才相对合理。”^⑤

第二，从交换环节来看，财富伦理有利于纠正交换动机的逐利偏失。财富伦理不仅是常态下对交换主体的理性关照，更是非常态下对交换主体趋利偏失的伦理纠正，它可以克服交换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欺诈、履约过程中的信用缺失和规范缺失的不正当竞争。

第三，从分配环节来看，财富伦理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财富伦理有助于正确处理市场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能够一方面有效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有利于在实践中消除平

① 参见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页。

② 见田宗介：《现代社会理论：信息化、消费化社会的现在与未来》，耀禄等译，厉以平监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1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页。

④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9页。

⑤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1页。

均主义;另一方面又使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合理状态。财富越多就意味着占用的社会资源越多,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第四,从消费环节来看,财富伦理有利于重塑人们的消费理念,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消费理念,既有助于摒弃禁欲主义的束缚,也有助于抵制享乐主义的侵蚀,使人们享受健康适度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

总之,财富伦理的当代意义在于能够有效地克服市场经济自发性所导致的道德缺陷,促进经济更加健康有序地运行,充分展示市场经济的合伦理性之维。

〔责任编辑:魏长宝 郑 飞〕

大学理念论纲

徐 显 明

拙作《生存权论》在《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发表,该文1994年获得全国首届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文章在理论上的意义,被评价为:开辟了法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实践上的作用,被评价为:是中国人权外交和人权白皮书的理论根据,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构作了理论准备;而在学术史上的价值,被评价为:在三项一等奖中,法学能列其中,这标志着中国法学从幼稚开始走向成熟。因论文获奖,我应邀作为社会科学界的三个代表之一,出席了团中央组织的“全国跨世纪群英大会”。我的人权研究之路从此坚定不移。此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陆续发表了《人权的体系与分类》等与人权有关的文章,我的人权观得以系统化。

在迎来《中国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之际,我深谢该刊在当时以极大的勇气和独特的眼光对我所给予的鼓励。《生存权论》一文,奠定了我在人权理论界的地位,也养成了我对社会问题以人权的立场进行思考的习惯。我永远感铭《中国社会科学》对一个青年学者的培养。近十几年来,我对人权仍保持着如初的学术兴趣,但把研究重点转向了人权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结合上。从法治与人权的视角观察中国高等教育,得出了一些不同于教育学家的结论。人权学者体悟大学时,总离不开制度、价值和教育权三个纬度,而此三点恰能揭示高等教育的现代特征。故此,作为向《中国社会科学》30年的贺礼,我想将我从法治与人权这一侧面追寻大学之道的体会捧献出来以飨大家。因为思考尚缺乏系统性,故以论纲名之。

一、大学是什么

大学之“大”,在于大德、大爱,在于大学问,在于有大师。“大德”意味着一所大学有担当民族责任的德性。“大爱”指的是以真理为信仰对象而升华的爱。教师对学生的爱,学生对老师的爱,因除去了世俗私利而成为“大爱”。父母之爱尚有自私的因素,教师基于传播真理而对学生的爱则是超越了回报要求而具有神圣性的爱。大学还是做“大学问”的地方。她追求的是“大道”,而非以谋生逐利为目的的职业训练所。集“大德”、“大爱”、“大学问”于一身的,堪称“大师”。大学之“大”,也包含有“大楼”的意思,它比喻大学应有良好的办学条件,甚至